



辛德勇：北大对我不公！我绝对配得上一级教授



北大对我不公

2004年秋，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已过去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来，我在北大历史系勤勤恳恳地工作，不管是教学，还是学术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2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五个单位进行文科一级教授评定试点，北京大学名列其中。学界一般认为，在学术阶衔上，这种文科一级教授，大致相当于理工科的院士。

在北大历史系初评时，我即落选。但当时我就感觉其间存在着不合理的非学术因素，因而当即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强烈抗议。

经过与当时学校分管领导以及校长郝平的沟通，郝平校长还特别指派当时的人事部负责人、今天北大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到历史系调研相关情况。在这之后，郝平校长不止一次向我允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第一时间把我补报上去；同时他还特别关照历史系党委书记，一定要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因此，我耐心等待了两年。2024年底，北大补报第二批文科一级教授。历史系通知我可以参与申请，我按照要求，递交了申请。

由于按照郝平前校长的允诺，我以为自己属于上次遗留问题，历史系党政领导自然会作为特殊情况做出安排。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既没有作为上次遗留问题做任何特别处置，而且直到2025年9月18日以前，北大历史系没有给我任何通知，没有告知评审结果——事实上我再一次落选了。

2025年9月18日，北大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员，在与我通话谈别的问题时，才漏嘴说出我没有通过这次一级教授补报的评审。稍后我询问北大历史系领导，北大历史系领导告诉我，校方并未通知历史系这次评审的结果，所以历史系也无法正式

通知我。

2025年9月22日上午，我求见历史系党委书记、主任，还有学术委员会主任荣新江。9月28日上午，历史系党委书记和系主任接见了我，但学术委员会主任荣新江拒绝见面，并称没有这个义务。我向系党委书记和系主任对这一结果表示严重抗议，并表示评审工作存在很不正常的因素，我对这一结果绝不接受，请学校领导给予解释。

2025年9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分管领导来历史系召见我，表示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再一次表示了严重不满和强烈抗议，请北大校方对这一评审的合理性予以说明。

此后又多次通过历史系党委书记，向学校转达了我的要求。时至今日，北大一直置之不理，没有任何说明和态度。

由于北大历史系领导表示，学校没有告知正式评审结果；学校人事部具体负责人也表示评审工作没有正式结束，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在经历这么漫长的等待之后，由于北大领导仍然不能就此次评定的合理性向我作出说明，现在我就把自己的诉求公诸社会，藉此希望负责一级教授评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能够了解相关情况。

我的学术成就

到2024年底补评文科一级教授的时候，除了多年来一直承担大量教学工作之外，已经正式出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外文翻译各类学术书籍60部。这样的学术成就，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文科教授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这些著述，不仅数量庞大，在质量方面也都颇具学术深度；同时还领域宽广，涉及诸多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支领域。

我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时“起家”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

历史地理问题。在这方面，我著述丰厚，著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简明黄河史》等，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地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方面，著有《制造汉武帝》。该书揭破了被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人为构建的一件史事，即汉武帝在其晚年，对治国理政的基本路线做了大幅度调整，可谓改弦更张。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田余庆，误把这一虚假的史事当作真相，大书特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我通过复杂而又翔实的论证，指出了司马光人为构建史事的历史缘由，从而也就订正了田余庆的错误。这一著述，体现出高深的学术研究能力。

年号纪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纪年制度，而且对东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而对年号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政治史密切相关。拙作《建元与改元》，第一次清楚指出年号纪年制度产生的时间和具体缘由。汉宣帝改用“地节”年号，表面情况，就相当怪异，背后则隐藏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鄙人首次全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王莽新朝的年号，是他建立王家统治的重要标志，构成形式，颇为诡异，鄙人第一次揭示了这些诡异年号的正确形式和政治意味。这些都是东汉前期撰著《汉书》的班固弄不清楚并做出错误记载的重大历史问题，解析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合理分析大量汉莽时期的文物遗存，还要深入解读《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难度极大。正因为如此，《建元与改元》充分体现了我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在中国古代印刷史方面，拙作《中国印刷史研究》，全面清理关于雕版印刷术起源的种种错误说法，第一次清楚指出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原因及创行年代，认为它的行用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



文 / 辛德勇

础知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和中国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都曾在这一问题上犯下过严重的错误。

在天文学史方面，敝人通过《天文与历法》和《天历探原》等论著、特别是《天历探原》一书，结合大量考古资料、古代文物与传世基本文献，对上古天文学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贡献，首次指明了以野猪象征上帝作为显著标志的华夏天文历法体系。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建。这一领域原有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是日本学者在战前撰著，鄙人这项研究全面颠覆了天文学史既有的研究，学术意义极为重大。

一个学者，不仅有学术职责，还有社会责任，优秀的历史学者更应当着力于此。

第一，拙作《天历探原》，不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还对中华文明渊源的研究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本人第一次明确指出，华夏先民基于天极崇拜的上帝信仰，不仅源远流长，至迟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而且这种信仰同希腊、罗马系统的太阳崇拜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这样的信仰，从八千年前开始就已遍及华夏大地。从陕北的石峁，到浙江的良渚；从辽宁的牛河梁，到湖南的高庙，东南西北，不仅高度一致，而且使用的共同的符号——野猪的脸面来表示这一信仰。因而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多元一体最好的证明。因为这是一种深层的精神信仰，必然要有共同的地域起源和相互之间的传播与接受。所以，这一研究，是对华夏文明研究极为重大的贡献，一点儿也不逊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时刻关注并及时回应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需求，应该是每一位负责任的当代历史学者理应承担的职责。在这一方面，本人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和《生死秦始皇》等书，就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迫切需求而动笔撰著的。这些著述不仅在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在撰著过程中，也深入挖掘和认识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问题。譬如秦始皇重视儒术的问题，譬如“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真相，譬如秦汉以前

下转 07 版